



主持人杨萌：近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今年合理确定赤字率，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使资金管得严、放得活、用得准，力求“精准滴灌”到需求终端，另外，在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今日，本报就上述内容，聚焦积极的财政政策。

今年赤字规模安排3.57万亿元 释放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信号

■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出，今年合理确定赤字率。考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经济逐步恢复，赤字率按3.2%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赤字规模为3.57万亿元，比2020年减少1900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分别为2.75万亿元和8200亿元。这样安排，既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积极取向，又释放出我国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信号，并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

“今年赤字率虽然比去年下降0.4个百分点，但仍然超出国际公认赤字警戒线3%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市场预期。”中

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得到全面稳定恢复；另一方面表明，还需要财政继续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如果贸然大幅度降低赤字率到警戒线以下，很容易形成财政政策断档，造成原有经济社会政策实施的接续不畅，要巩固疫情防控来之不易的良好成果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还有必要保持适度规模赤字以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提高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助力。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赤字率按3.2%左右安排，说明中央对今年的经济发展预期要好于去年，故而在今年在财政上的举债力度必然会较去年有所下降。

《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从财政资金的安排方式来看，今年的财政赤字有一部分将会用于支持地方专项债的新增额度和中央投资的资金补充，即赤字融资将有一部分会用于支持项目投资。今年的赤字融资或将有一部分会直接用于支持民生、就业、社会服务，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等事项。”唐川说。

张依群表示，从财政政策角度看，保持适度规模的赤字率，在财政继续深入推进减税降费、降本减负的背景下，有利于弥补财政增收带来的资金压力，有效增强财政政



策回旋余地，保证财政资金运行安全和财政刚性支出的基本需求，从而为实现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更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撑。

“我国连续两年赤字率安排突

破3%，充分展示了我国财政政策有着非常强的调控空间、调控韧性、调控能力。虽然我国赤字率连续突破3%，但赤字规模总量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恢复增长，仍然处于总体可控的空间范畴。”张依群表示。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25万亿元 重点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刘琪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如是说。而在近期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这一表述。

《报告》指出，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合理安排赤字、债务、支出规模，不急转弯，把握好时度效。另一方面，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以

更大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财政支出总规模较2020年有所增加。《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588.03亿元，完成预算的99.1%，增长2.8%。而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25万亿元，增长1.8%。同时，《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了2000年以来的数据发现，2020年财政支出创下新高。在此背景下，今年财政支出安排进一步加大的原因有哪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理论上来说，财政支出规模随着经济

体发展成熟不断增加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工业化、数字化的社会生产变革增加了对政府活动的需求，人们的高质量生活和社会的高质量生产也会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通讯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促使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从现实上来说，2020年在面临疫情影响后，社会生产秩序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经济增长势头较为良好，这是财政支出增加的重要支撑。”盘和林认为，2021年财政方针将会进一步加大对民生、市场主体方面的重视，以及还有一系列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国家重大战略，再加上适逢“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有大量的方针、工作需要完成，因而这也要求一个更大的财政

支出规模。当然，抗疫特别国债的取消也增强了财政的持续性，给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报告》亦指出，财政支出总规模比去年增加，重点仍是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着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资金需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同时，《报告》提出，2021年主要支出政策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二是，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三是，支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四是，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是，支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六是，加强基本民生保障；七是，支持国

防、外交和政法工作。

在盘和林看来，今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首当其冲是民生领域，当前我国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其次，在产业升级方面，日前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等，因此财政支出也需要在这个方面提供支持。第三，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近几年一些卡脖子技术阻碍了我国的社会生产，所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2021年的重要任务之一，财政支出也会有所侧重。第四，国防方面《纲要》也作出了重点规划。

今年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纳入2.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出，今年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使资金管得严、放得活、用得准，力求“精准滴灌”到需求终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将2.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规模明显大于去年，为市县基层惠企利民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财力支持。

今年直达资金 主要来源是转移支付资金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是国家建立常态化直达机制的重要举措，是完善中央转移支付机制

的重要方式。资金直达减少了中间环节，在时间上可以及时将资金下达，在效果上可以有效确保资金直达地方，提高财政资金的直达效率和使用效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我国采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后，为更好地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传递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必要继续完善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其中今年把2.8万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以便扩大直达机制的使用规模，确保把中央财政资金用得更精准，用在刀刃上，发挥更大的效应，确保省级财政当好“过路财神”、不当“甩手掌柜”，确保宝贵的财政资金能“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县基层惠企利民。

去年我国创新实施新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对2万亿元资金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今年3月6日，财政

部发布的《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仅用20天时间，就将95%的中央直达资金下达市县基层，省级财政细化下达时间平均只有1周，速度前所未有”。目前，财政直达资金预算下达已经完成，其中1.56万亿元资金已经投入使用，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效果明显。

“去年的直达资金主要是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今年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财政直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转移支付资金。同时，今年财政直达资金的范围扩大，导致规模增加，如增加了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崔志娟说。

刘向东表示，去年采取特殊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保障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地方主体责任不变、资金分配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

快速直达”的原则进行。与去年相比，今年财政直达机制更强调精准滴灌到终端需求，确保用好资金，管好资金用途和促使更快落地见效。

今年扩大 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

《报告》表示，今年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按照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的原则，在保持现行财政体制、资金管理权限和保障主体责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纳入直达机制范围，涉及中央财政资金2.8万亿元，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

“今年要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效能，除了扩大范围之外，还

要优化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的规范分配、高效使用、有效监控、科学评价机制，增强直达机制政策效果，切实把纳税人的钱用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现财政宏观调控方式和资金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刘向东说。

崔志娟表示，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需要做好资金的监管，对此需要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发挥好财政部门的资金分配监管、人民银行的资金拨付监管、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监督、使用部门的业务指导监督作用。二是健全完善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拓展数据分析和预警功能，推进部门间数据开放共享，并通过完善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标识的资金使用台账制度，记录资金所处状态。三是加大直达资金信息的公开公示力度。通过直达资金的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针对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

92家公司发布2020年度分红预案 6家公司股息率超3%

■本报记者 张颖

在年报时间窗口，高分红绩优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历史经验看，在大盘弱势震荡、风险偏好低迷期间，高股息品种凭借较为确定的股息收益，“安全垫”作用明显，成为资金青睐的避险资产。

无疑，股息率是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发现，截至3月14日，沪深两市有

92家上市公司公布2020年度分红预案。

“在我国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也是反映公司经营情况的重要信号。分红能增加投资者的回报，提振市场的信心，营造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理念。”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壁虎资本基金经理张小东表示。

进一步统计发现，以公告的每股税前派现额为派现基准，以最新收盘价为基准股价，股息率超过1%的公司有37家。其中，百川能源、

双箭股份、永新股份、吉鑫科技、绿茵生态、沃华医药等6家公司股息率均超3%，分别为6.01%、5.16%、5.13%、4.11%、3.95%、3.49%。

从估值方面看，上述6家公司中，有5家公司最新动态市盈率低于A股整体的22.63倍最新动态市盈率。其中，双箭股份、绿茵生态、百川能源、永新股份、吉鑫科技等公司最新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2.64倍、14.05倍、15.6倍、16.54倍、20.36倍。

对此，银泰证券策略分析师陈建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低估值

高股息的龙头股更多具备的是配置价值，以获取相对收益。一方面估值以及业绩确定性背景下，其调整的空间可能相对更小，另一方面高估值也有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投资收益。

在受到各方认可的情况下，上述6只高股息个股，近期表现可圈可点。统计发现，3月份以来，吉鑫科技（10.18%）、百川能源（6.6%）、绿茵生态（5.4%）、双箭股份（4.64%）等4只个股股价均跑赢同期上证指数（跌幅1.6%）实现上

涨，尽显强势。

对于后市的投资，金百临咨询分析师姜洪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来看，A股市场短线虽有波动，但演绎趋势、发展方向仍可期待。主要原因，不仅是A股所背靠的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还因为A股市场的流动性、税收制度、交易成本是全球资本市场中最为具有吸引力的。在操作中，不畏浮云遮望眼，在正视短线波动的同时，积极调仓，加大对代表中国产业发展方向的核心资产股的投资比重。

（上接A1版）2018年末该账户显示余额122亿元，是累计归集金额，并不是真实的银行存款余额。虚假销售收入回款打入北京银行账户后，被归集到康得集团账户再被循环用于造假所需虚假销售收入回款，故未有证据证明大股东单方面占用康得新资金。

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 需市场各方形成合力

去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同年12月31日，沪深交易所发布退市新规。资本市场常态化退市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市场人士认为，此次退市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有助于构建与注册制理念相匹配的退市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快出清僵尸企业，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除康得新外，今年还有8家上市公司确定强制退市，6家为面值退市，2家为财务退市，均已收到交易所终止上市的事先告知书或决定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是贯彻中央深改委部署要求的重大改革举措，有助于加速市场优胜劣汰，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但是，由于退市触及多方“奶酪”，所以退市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遭遇多重阻力。近日，康得新披露追溯调整后的年度报告后，网上有个别人发布消息质疑该结论，并举报监管部门人员。

“自2月28日康得新披露追溯调整后的年度报告以来，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大量散布不实有害信息，恶意造谣诽谤，抹黑监管政策和稽查执法，攻击退市制度改革，甚至对监管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诬告陷害，妄图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个别投资者在公司多次提示存在退市风险的情况下，仍在大量买入此股票，并带头滋事诽谤。上述行为本质是意图向政府和监管部门施压，拖延和干扰康得新退市进程，从而达到其个人目的，进而牟取不正当利益。

“整体而言，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长期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呈现‘退市率低’的特征，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制度建设不够健全和市场监管不够有效；另一方面也与一些上市公司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规避有关。”有关专家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国家正有序推进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在退市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在综合考虑各方建议和利益的基础上，让市场各方形成合力来共同克服阻力，推动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改革有序、有效推进。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将会同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退市过程中出现的对抗监管、不正当维权甚至煽动群体性事件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退市改革平稳推进，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开展民事追索 投资者需依法维权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有可能一些投资者会因为投资退市股票而蒙受损失。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投资者应理性依法维权。即使出现问题，也要严格依照法律维权，不要出现恶意攻击、造谣、煽动闹事等违法行为，通过合法途径来切实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关专家表示。

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也是推进退市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康得新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将积极支持康得新投资者通过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申请适用示范判决机制、普通代表人诉讼及特别代表人诉讼等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依法适时启动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并提供其他相应法律服务。

实际上，近年来，投资者索赔方式和索赔对象不断丰富和拓展，揭露地案案例，指使或实施财务造假的公司高管、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已经被判令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大幅提升。

如2019年11月份，投服中心首次提起的对大连控股证券支持上訴获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支持，大连控股时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代某被判承担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大连控股、时任财务总监周某林承担连带责任。投服中心表示，首单“追首恶”支持上訴获胜，对于一系列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不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个人列为被告，甚至劝说投资者撤回对个人追责极具意义，释明了类似案件中上市公司在赔偿投资者损失后，向主要责任人员追偿的司法审判基础。

去年7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代表人诉讼制度分为传统加入型的普通代表人诉讼和声明退出型的特别代表人诉讼，便利投资者提起和参与诉讼，降低维权成本。同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知》，投服中心发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特别代表人诉讼业务规则（试行）》，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激活。

在实践中，普通代表人诉讼已经取得进展。去年12月底，杭州中院对五洋债欺诈发行案进行一审判决，这是国内首起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的公司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标志意义。据法院判决，公司实控人陈某某、德邦证券、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五洋建设建设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10%范围内、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所在5%范围内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赔偿总额超过7.4亿元。

“退市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强调应退尽退并不意味着一退了之，而是要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立体化追责。”汤欣表示，新证券法设立投资者保护专章，构建了全方位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为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更加畅通的渠道。风物长宜放眼量，市场各方应当共同致力于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